

新课程语文教学论



■ 语文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 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

■ 语文课程教学设计

■ 阅读教学研究

■ 写作教学研究

■ 语文课程评价

新课程语文教学论

赵跟喜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课程语文教学论/赵跟喜编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608-931-4

I. 新... II. 赵...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1889号

新课程语文教学论

赵跟喜 著

责任编辑:王天芹 周 珺

装帧设计:房 娴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246

印 制:兰州军区政治部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770号

邮政编码:730000

发行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259千字

印 张:10.3125

版 次:200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4月第1次

印 数:1—1200册

书 号:ISBN 7-80608-931-4

定价:19.6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演变	(1)
第一节 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1)
第二节 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10)
第三节 当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18)
第二章 语文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25)
第一节 语文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概论	(25)
第二节 新课程呼唤全新的语文教学	(34)
第三节 构建新型语文课堂	(40)
第三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及教学目标	(44)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性质	(44)
第二节 语文课程目标	(51)
第四章 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	(71)
第一节 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的原则	(71)
第二节 读写听说相结合的原则	(73)
第三节 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	(75)
第四节 语文教学的开放性原则	(77)
第五章 语文课程教学设计	(81)
第一节 语文课程教学设计概述	(81)
第二节 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方案设计的类型和方法	(84)
第三节 语文新课程教学设计	(118)
第六章 识字与写字教学研究	(157)
第一节 识字与写字教学的意义及目标	(157)

第二节 识字与写字教学的方式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163)
第七章 阅读教学研究	(176)
第一节 阅读及阅读教学的意义	(176)
第二节 阅读教学的过程	(178)
第三节 我国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	(181)
第四节 各类课文的教学	(188)
第五节 新课程视野中的阅读教学	(215)
第八章 写作教学研究	(224)
第一节 写作教学的意义、目标及任务	(224)
第二节 写作教学的过程和方法	(233)
第九章 口语交际教学研究	(255)
第一节 口语交际教学的意义	(255)
第二节 口语交际能力的构成	(257)
第三节 口语交际能力训练的方式方法	(259)
第十章 语文课程中的综合性学习	(276)
第一节 综合性学习的特点及学习目标	(276)
第二节 综合性学习的实施及评价	(280)
第十一章 语文课程评价	(292)
第一节 语文课程评价概述	(292)
第二节 语文课程评价的功能及原则	(293)
第三节 语文课程评价的方法、步骤及操作案例	(296)
第十二章 语文教育工作者	(308)
第一节 语文教师的素质	(308)
第二节 语文教师的工作	(317)
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33)

第一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并无独立的语文课程。语文教学是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教育等融为一体的。但古代教育教学中那些具有人文性、工具性及基础地位的部分内容，已显露出语文课程的萌芽。中国古代在语文教学和学习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课程作为教育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课程的内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

中国古代教育有三种表现形式：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社会教育没有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因而也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但原始社会课程内容却存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也已存在。比如：原始的宗教祭祀、原始艺术（歌唱、绘饰、雕刻等）、原始记事（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中，都有不少语文课

程与教学的内容；原始人群在生产劳动、生活之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

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教育也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事业。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具有共同性，即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育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封建的政治制度表现为专制主义的特点。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课程上都有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在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学典籍为主，主体是“五经”。

中国封建社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历时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具特色。其基本特点是：先教学蒙学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体的儒家经典；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

（一）“三、百、千、千”

我国古代流传的最著名的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主要作用于集中识字。

1. 《三字经》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容量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

叶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很有特色。该书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2. 《百家姓》

相传为北宋人所编，作者佚名。全书集姓氏四百余个，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句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3. 《千字文》

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编。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恰为千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不同的字。

4. 《千家诗》

作为蒙学诗歌读本，是在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流传广泛的有王相选注的《新镌王言千家诗》和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后人把这两种《千家诗》合二为一，共选出二百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

(二) “五经”、“四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汉代以“五经”为课程，宋代以“四书”为课程。

1. “五经”

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五经”的内容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在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四书”

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称。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为封建

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一直被沿用到清末。它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但它对我国整个汉语文教育的发展，却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的政治、教育、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文选读本

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故又称《昭明文选》。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编的《文章规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等。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经验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认知教学

认知教学的经验主要有五条：

1. 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

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特点，决定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个左右为宜，而“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这个阶段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学，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义教学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后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并逐步加深和扩大。

2. 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

韵语和对偶的使用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使用整齐的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①

3. 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

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三字经》中就有这样的内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②。

4. 联系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这也是“三、百、千、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

5. 激发儿童的兴趣

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为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大都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还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75~7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② 《三字经在国外》,载《华商报》,1994-6-17。

“歌诗”课程，不仅能教学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培养情趣、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

（二）语言训练

语言训练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诵读。古代教育家在蒙学和读经教育之间，还安排了一些过渡性的知识读物和语言训练。知识读物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韵语知识读物。这类读物宋代以前就有，宋以后发展成为古代蒙书中数量最大的一个门类。从内容看，有介绍掌故的，如《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等；有介绍历史的，如《史学提要》；有介绍各科知识的，如《名物蒙求》；有进行训诫的读物，如《弟子规》等。从形式看，多为三言、四言或六七言错落的句子，整齐押韵，易诵易记，可以增加儿童的阅读兴趣。第二类是散文故事。大都是记叙性体裁，一则只讲一个故事，很适合儿童阅读。这类故事可分为名物掌故和历史人物两类。宋代以来较流行的有《书言故事》《白眉故事》《日记故事》《蒙养图说》等。第三类是诗歌。唐宋以来，儿童在读散文故事的同时，也选读一些浅显的诗歌。宋代以来较流行的有《千家诗》《训蒙诗》《神童诗》《小学弦歌》等，其中以《千家诗》影响最大。诵诗背诗能够增强儿童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像力，是训练语感的极好方式。

语言训练的另一方式是“对对子”。练属对的目的为写作骈文和写作近体诗打基础，训练的内容既有语音、语法、语汇，又有修辞和逻辑，因此，属对实质上是相当全面、相当严格的语言训练。清人崔学古把属对叫做“通文理捷径”。指导属对的课本有《对类》《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训练的形式，从“一字对”练起，练到“四字对”及“多字对”。例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古代教育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主要靠的是读写实践，另外古人也给学生提供一些简便的工具书，让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去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于是，宋代以来便有不少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问世。代表性的语文知识书有《文字蒙求》《文字举隅》《切字捷说》《虚字说》等；较流行的语文工具书有《字汇》《养蒙针度》《小学紺珠》等。古代教育在语言训练中教给学生使用基本工具书的方法，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三）读写训练

经过集中识字和必要的语言训练之后，古代语文的认知教育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读写训练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这一阶段，阅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读经书和古文。读经书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不仅要求背诵，而且要求理解它的内容，并学习它的表达方式。读古文主要是选读重要史书上的篇章和历代名家的散文，宋代以来较流行的古文选注评点课本有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规范》、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古文标注》；清代流行的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等。二是读诗赋和涉猎用书。学诗用的教材有《玉台新咏》，清代流行的有《唐诗三百首》和《古唐诗合解》；赋的选本有《骈体文钞》等；词的选集有《花间集》《绝妙好词笺》及《宋词三百首》等；涉猎用书有《经余必读》等，相当于今天的课外阅读书。三是读“时文”。教学一些当时中了状元、进士的人作的八股文章，但为数不多，属于一种补充性质的读物。

古代的作文训练跟科举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作文的内容大多限于“四书”和“五经”的范围，用文的形式一味地学习八股的格式。今天看来，除一些作文训练的原则方法有借鉴价值外，其内容和形式皆不足取。

如果从语文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的角度来看，古代教育的一些经验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第一，是循序渐进的方法。《中庸》认为学习的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代朱熹概括阅读教学的序是：“自博而约，自易而难，自近而远。”朱熹把“循序渐进”放在读书法的第一位，要求读通一本书才能读另一书，每本书从头至尾亦各有序，读时不可凌乱，他说“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避免“疏易陵躐”的毛病。循序渐进实际上包含了教育学上常用的系统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现代教学理论及实践证明，知识系统和儿童的接受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旧系统可以打破，儿童接受能力可以不断提高，也就是要根据语文教学的发展情况建立新“序”。古代教育家有时把循序渐进看得过死，造成明显的片面性。但是，如果认为可以不要循序渐进，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第二，是学思并重的方法。孔子提出学思并重的观点，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也说：“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学思并重成为古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古代教育家提倡学生要“有疑”，认为“疑”可以有助于思维能力的提高。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解惑”，解除学生的疑惑，教学就前进一步了。王夫之认为“疑”与“信”是相辅相成的，“信者以坚其志，疑者亦足以研其微”（《读四书大全说》），读书有疑才能有新的创见。总之，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学习才会有显著的进步。

第三，是启发诱导的方法。孔子最早提出并实行了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启发式就是采取有效措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原则。《学记》对启发式教学作了最完善的发挥，它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

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引导而不是牵着走、勉励而不强使屈从、开导而不全部告以现成结论，就是强调要激发学生的思维和积极性。启发式教学与因材施教是密切相联的，不少教育家把二者统一起来，运用于教学实践中。问答法是贯彻启发式教学的常用方式，但不是惟一的方法，如果教师接二连三地提问，表面看来很热闹，但学生思维不一定在积极活动，这样提问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总之，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因此注意了解学生的认识规律和心理状态，掌握适当时机，控制教学的难易程度，多方面激发学生好学乐学的兴趣，使学生始终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从而培养出许多“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学生。他们的实践说明，启发诱导的确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第四，是读写结合的方法。关于读写结合，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汉代扬雄说：“能读千赋，则能为之。”（《答桓谭论赋书》）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元代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清代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古人对读书与作文之间的关系，对读写结合相互促进的道理，可谓阐述得淋漓尽致，精湛绝伦。这些论述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古代语文教育泥沙俱下，珠砾混杂，有精华，也有糟粕。因而，学习语文教育史，了解语文教育的传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继承优良传统,摒弃封建渣滓,以促进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二节 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如前所述,在古代,我国各类学校并未专设“语文”学科,语文的学习是与学习经、史、哲、伦理学糅合在一起的。汉代以后,各类学校的教学又主要是研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于是语文成了读经的工具和手段。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盛行,语文又沦为科举的附庸。可以说,我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程。

到近代,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癸卯学制颁布实行。随着新学制的诞生,语文学科(初级小学称“中国文字”;高级小学和中学称“中国文学”)也应运而生。语文课程单独设置以来的百年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于每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因此每一时期的语文课程设置都有它的特点,现分述如下。

一、清末民初的语文课程设置(1903—1918)

这是语文课程的初创时期。一方面,语文学科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有了自己的教学目的和教科书;另一方面,语文学科仍与科举时代的读经讲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中学教育规定为五年(辛亥革命后改为四年),在十二门必修科目中有“中国文学”、“读经讲经”两门与语文课程相关的科目。中学每周上课36小时,其中“中国文学”一科每周4小时,而“读经讲经”一科每周9小时,占全部课程的 $\frac{1}{4}$,可见当时儒家经典在语文教育乃至中学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然而,“中国文学”课程毕竟独立开设了。在相应的教

学用书中，较有影响的是刘师培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共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选，再次选文。这样的编排，别具一格，打破了历来文学读本成规，但过于强调“六书之文”的“小学”。

1908年出版问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是吴曾祺选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全书分五编，由近及远按文学史选文，先本朝，次金元明，次五代宋，次晋唐，次周秦汉魏。它不选词赋和骈文，只选文言散文。在编写体例上也有特点，每集之首，有例言一编，综述文家渊源、文章优劣，有独到之处。每编之中，有眉批，有评语，旨在启发学生。这是清末编得相当好的一套书，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的同时可获得文学史常识。但是全套教材选文过多，分量过重。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国文科教学目的为“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①教学目的明确，不仅要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还要培养文学兴趣，启发智力。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七年中，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掀起三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每复古一次，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就遭一次劫难。至民国七年，教育部才第一次公布重行审定的教科书，并将以前审定的教科书重行厘正发表。

在民国初年所印的各种国文教科书中，影响较大的当推由谢无量编选、中华书局印发的《国文教本评注》。这套书共四册，选文319篇，以文言散文为主，兼收少量的铭文和诗赋。每册按文章体制分类编排。有评析，注意文章作法指点。

^① 第一次教育年鉴

这一时期，中学语文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中学开设，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未深入到学科领域内部，但是它毕竟在中学教育中取得了一定的位置，为以后中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五四运动后三十年间中学语文课程设置(1919—1948)

五四运动(1919年)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口号，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推行国语运动，即白话文运动。在此以前，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全选文言文，内容陈旧，言文不一致，脱离现实生活，儿童学习难以入门。在全国文化教育界的一致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24日下令将国民学校（初等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旧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逐渐用语体文改编。教科书由文言改为白话，看起来只是教学语言的变革，但实质是文化教育事业里程碑式的飞跃进步。这三十年间，中学语文课程设置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国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于1923年6月公布了《中小学课程纲要》。《纲要》规定：初级中学课程分为社会科、语言文学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六科。初中毕业要求学完180学分，其中国语科32分，占全部课程的1/6强，仅次于外语科（36学分）。高中课程分两类，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另一类以就业为目的，分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农业科及家事科等。普通科又分为两组，一组注重文学及社会科学；另一组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各科各组的课程分为三部分：公共必修科目、分科必修科目、纯粹选修科目。高中毕业要求学完150学分。国文科在公共必修科中占16学分，在文科必修科中占8学